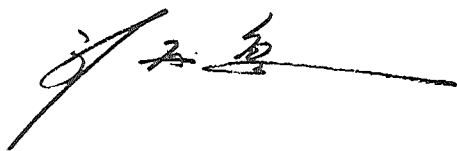


理性重評百年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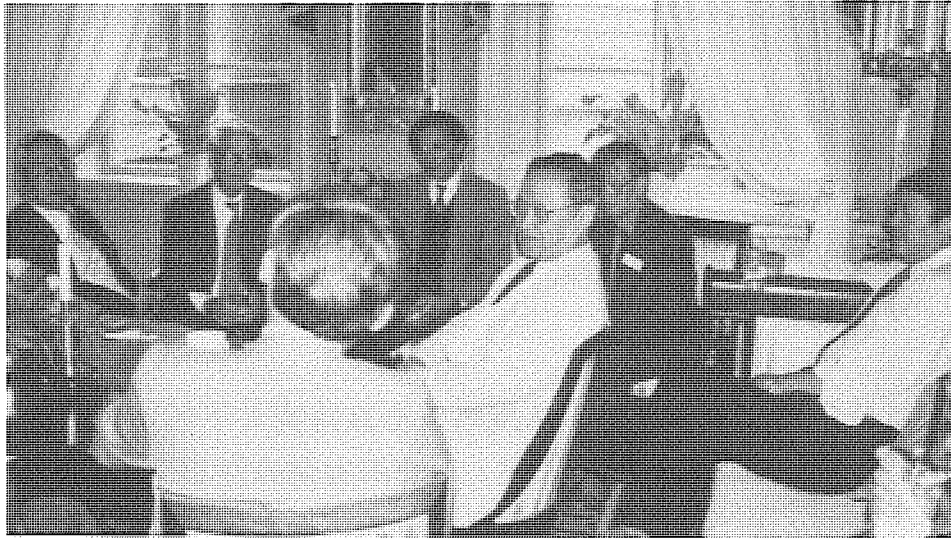


過兩三年，就是戊戌變法一百周年，中國再次面臨着改良變法和激烈革命的選擇。百年中國的歷史，無論遠近，都值得重新解釋。如果經過理性重評百年中國，我們能夠避免背負二十世紀的沉重包袱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門，那真是一種大幸。

我和李澤厚的對話錄《告別革命》發表後，引起了兩極性的反應，無論是共鳴還是反對都很強烈。在這種反應中，我感到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極其關懷。沉默和冷漠只是暫時的。面對一百年來自己的國家所走的歷史道路和這條道路上的崎嶇與壯闊，特別是面對充滿血和荊棘的深重苦難，不能不思索，不能不百感交集。我對一切激烈的批評和讚譽都能理解，並被一些嚴肅的反應所感動，儘管我早已不注重外在高低優劣的評語，而注重自己內在自由而負責的聲音。

過兩三年，就是戊戌變法一百周年(1898-1998)，中國歷史彷彿又回到原點上，再次面臨着改良變法和激烈革命的選擇。不變是沒有出路的，這是共同的認識；如何變，則看法歧異。不同的看法與對百年中國的歷史評價相關，因此，對二十世紀中國的認識，也就是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認識，便成為中國學界最為關注的問題，我和李澤厚的對話錄就是給中國百年歷史提供一種新的認識，也可以說是新的解釋。這種解釋既告別昨天流行的革命崇拜和必然性崇拜等思路，也想尋找屬於中國的獨特的出路。李澤厚認為，在現今的世界上，唯有中國存在着走出一條獨特發展的道路的現實可能性，即通過自身選擇的方式走進第一世界但又區別現有第一世界的可能性。我想，我們應當珍惜這種現實可能性，珍惜這種歷史機會。但是，尋求獨特之路不是以民族主義立場去排斥西方經驗，更不是以「反對帝國主義話語霸權」的口號下，排斥西方數百年來的理性成果，而是充分吸取西方的經驗教訓但又充分考慮中國具體的歷史情景和現實情景。

在尋找中國獨特之路的時候，中國的學人們自然要從西方的歷史經驗教訓和自己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提出問題。中國學者群體的一部分，經過數十年文化專制的摧殘和洗劫，已經缺乏提出宏觀問題的能力。現在重要的是從教條的



本刊編委及朋友在1993年斯德哥爾摩國際學術會議上。左起余英時、馬悅然、李歐梵、王元化、蘇紹智、劉再復、張灝(前排背影)。

重壓中抬起頭來，也從固有的沉重結論中抬起頭來，復活提出問題的勇氣和能力，理性地探討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方式。重新認真研究國學，不是為了表現學問的姿態（現在賣弄各種姿態的文章太多，令人失望），而是為了尋找新的精神資源，因此，自然地應當從國學研究中提出前人未曾意識到的問題。研究西學，更應當從中提出屬於中國特殊的問題。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命題（如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等）都有自己具體的對象、時空層面和歷史場合，他們的「他者」常常是學院內的權威，如果我們只注意他們的語言，忘記他們的語境，只移植他們的理論命題，忘記說明生產這一命題的歷史場景，那麼這種移植就是一種片面移植。片面移植必定喪失提出問題的能力，更不可能準確地回答時代對中國的挑戰。

百年中國的歷史，有一部分時間距離較遠（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有一部分時間較近（如下半葉的歷史），無論遠近，都值得重新解釋。遠有遠的好處，長距離觀照容易冷靜，八十年到一百年的距離可以使我們理性一些。但近也有近的好處，近距離所發生的一切，包含着我們自己可靠的切身體驗，歷史本文中有我們自己用血肉書寫的一頁，生命與歷史貼得更緊，只要有理性態度的支撐，完全可以產生極有價值的思考。

總之，理性重評百年中國，可能是今後中國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我自己從文學研究的原初基地出發，也將參與這種闡釋和重評，如果經過共同的闡釋，我們能夠避免背負二十世紀的沉重包袱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門，那真是一種大幸。